

背叛了原著的《繁花》何以迷人？



热播电视剧《繁花》根据金宇澄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改编 本版供图 视觉中国



金宇澄

谁也想不到,2024开年电视剧大爆款居然是《繁花》。

金宇澄的原著小说《繁花》获奖无数,却也是出了名的“难读”。一堆分不清谁是谁的人、不分行的对话、挨挨挤挤的大段落,很多读者表示根本啃不动。

文学性强,人物关系、故事线庞杂,且通篇沪语或暗藏着背景。王家卫虽然一眼相中预做影剧,但琢磨剧本多年也说“难改”。捂了十年,直到数月后才放出一小段片花,却被网友吐槽为“奢侈品男装广告”,眼镜王的“高级审美”能否接上电视剧观众的“地气”,着实让人捏把汗。

就连作者本人也说,小说《繁花》不适合影剧改编。

现在,难读又难改的《繁花》“响了”,高开高走,豆瓣评分8.2。“原著党”们虽略有微词,也不得不说一句:王家卫用心了!

现代快报+记者 陈曦

上海,上海

考虑到观众的接受,剧版《繁花》贴心地推出了“普通话版”和“沪语版”。然而更具话题度的还是“沪语版”,观众纷纷表示“很上头”。有网友说,看《繁花》不看沪语版,就相当于去重庆火锅店点清汤锅底。宁波、杭州、苏州、常州等“包邮区”观众追剧热情更是高涨,纷纷发弹幕:这句我听得懂!

小说《繁花》分两条叙事线,一条从20世纪60年代讲到80年代,一条讲90年代,如此交织反复,最终收拢到一起。以阿宝、沪生、小毛三位好友的际遇,勾勒出上海市井生活的真实样貌。电视剧砍掉了一条线和沪生、小毛的戏份,直接切入9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涌动的上海。煌煌大时代,人人争上游,曾经一文不名的“阿宝”,已是叱咤风云的“宝总”。短短十年,除了个人奋斗,他需要时代的托举。

《繁花》讲的就是时代。彼时,作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的上海,成为出口贸易的枢纽以及国际经济、金融、航运、科技创新和服务业的中心,完成了“起飞”。不管是阿宝们在证券交易所门口的抢购,还是在外贸生意里的打拼,讲述的都不仅仅是上海本地的变化,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巨变。

《繁花》讲的,也是江浙沪“包邮区”梦幻联动。小说中,陪阿宝、陶陶夜游沧浪亭的苏州“范总”,在电视剧里变身杭州湖西针织厂的范总,与宝总斗智斗勇、珠联璧合,在外贸大潮中一飞冲天。宝总只身前往“高仿品老板”麻总的诸暨工厂看货谈合作,目的是依托江浙一带活跃的民营企业,打造更多“上海名牌”……

地缘相接、人缘相亲、文化一脉,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江浙沪,联手绘就大时代的繁花似锦。

底色

小说《繁花》用上海方言写,但金宇澄认为是受到苏州腔影响后的上海话。他在写这部小说时,脑海里的说书先生就是说苏

式吴语的父亲。虽说出生于上海,金宇澄始终称自己是苏州黎里人,每一本书上的作者介绍栏中都会写着“祖籍吴江黎里”。

2020年,接受“十三邀”访谈时,金宇澄坐在黎里荒废的金家老宅中谈起了《繁花》:

有一年的冬天,他在路上遇到一个美女,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上海静安寺一带有名的美人,现在却像老太太一样在马路边卖小孩的衣服。她不认识他,他却认得她,感慨万千:“倒不是说她怎么会这么落魄,而是她让我想起了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中的玛琳娜,这么美的一个人,怎么会这么老!”

纷繁旧事全部涌现,挡也挡不住,他便提笔写《繁花》。

阿宝祖先是资本家,1949年后公私合营,还能住独栋大洋房。阿宝父亲是有志革命青年,脱离资本家家庭从事地下工作,上海解放后没几年剥夺一切待遇,发配到杂货公司做会计……阿宝的家史,差不多也是金宇澄的家史。

金父脱离黎里大家族,赴上海成为潘汉年麾下白区特工,被日本人逮捕又侥幸获救,历经沉浮;金母是银楼家的千金小姐,复旦中文系毕业,进步青年。金宇澄在上世纪9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追忆父母,当时他以“伯父、伯母”代指“父亲、母亲”。2013年,父亲去世,金宇澄才改为“我父亲”“我母亲”。“因为父亲在的时候是绝对不允许我写这些东西的。他们系统从来不谈自己的事,这是潜移默化的一个规矩。”金宇澄此前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说。

《繁花》里面有一章,大概有五千多字,是一个老太太在讲述她的一辈子,调子非常低沉。老太太已经双目失明了,邻居希望她早一点死,这样房子就可以腾出来,她的丈夫是一个“汉奸”,很早就被枪毙了,实际上是一个地下党人。这一块写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和金父系统里的一些情况,只是把它小说化。

说书人

小说《繁花》像是金宇澄个人的记忆宫殿。他以自己几十年

在上海的见闻,一点点填满故事细节。电视剧删繁就简,将浮城往事拍成了“商战爽剧”,“原著党”不太买账。

《繁花》写什么呢?金宇澄自己的概括是:八卦。

小说最初是“网络文学”。金宇澄自2011年5月在“弄堂网”开帖创作《繁花》,每天更新,根据读者反馈及时修订甚至改变情节走向。

“我的初衷,是做一个位置极低的说书人,宁繁勿略,宁下勿高,取悦我的读者——旧时代每一位苏州说书先生,都极为注意听众反应,先生在台上说,发现有人打呵欠,心不在焉,回到船舱,或小客栈菜油灯下,连夜要改。我老父亲说,这叫‘改书’。”

宝总和三个女人的情感纠葛是剧版《繁花》里很重要的看点。唐嫣简单明快的性格跟汪小姐不谋而合,娇嗔无心机,又独立勇敢,“宝珠CP”也最得人心。马伊琍演玲子,将上海小女人的“嗲、作、精”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每次一出来,网友跟着爷叔喊她讨债鬼,反感这个女人时时刻刻都在算计阿宝的钱。但其实,上海方言里,讨债鬼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昵称。阿宝明知道她敲竹杠,既乐得哄她高兴,又巴不得情债钱偿,一来一去,愿打愿挨。

人戏深的观众批评宝总“处处留情”,像是天使投资人帮助三个女人完成梦想。帮汪小姐当科长,帮李李解决危机,萍水相逢给玲子开店。对谁都有情有义,又好像谁都不爱。其实小说《繁花》写了更多“毁三观”的男女情事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《繁花》难拍的原因。

小说上来就是陶陶拽着沪生讲菜场八卦;摆蛋摊的男贩,和对面摆鱼摊的女贩,日长事久,眉来眼去。正文更有大量香艳故事:守活寡的少妇出轨邻家少年,因为政治原因不得不割席的夫妻悄悄约会……

金宇澄说,要尊重人性的复杂。

错位

电视剧《繁花》主要讲的是九三、九四年的上海,这其中有家卫对上海上世纪90年代的想象,这想象是和金宇澄这个本土上海人的原作不一样的。

那时的上海,黄河路也好,乍浦路也好,并没有剧中那么多那么璀璨的招牌和霓虹灯,那时的上海才开始从低沉状态中复苏。

“说起来也真是难以置信,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霓虹灯闪烁的不夜城上海,直到1991年的上海国庆节外滩和南京路才重又点亮霓虹灯。”同济大学教授张生记得,亮灯的那天晚上,他和朋友随着拥挤的人流从外滩沿着南京路一直走到人民广场,然后又走回外滩,感觉南京路从来没有这么拥挤过,稍微不小心身边的人就会被人冲开。“那个时候,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梦想,就像这重新点亮的霓虹灯一样,热情地投入到生活之中,去为自己的未来努力奋斗。”

“电视剧把上海的灯红酒绿提前了。”复旦大学教授邵元宝印象中,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上海依然穷酸破败,普通市

民包括文化人的物质生活也都是贫穷单调的。浦东开发刚刚开始,但还看不出苗头。国营企业改制还没开始,搞个体经济的主要是一些“社会人”。至于做外贸、炒股票,并不是主流。“大家都缺钱,但又没有挣钱的路子。港台风进来了,欧美电影电视剧进来了,看看人家的日子,自己也想消费,可又没钱,心理就有落差。”

人人都在寻找机会。年轻人出国是主潮,大学生要出国,工厂里的青工也要出国。《繁花》里,玲子、菱红都是从日本回来的,反映了当时的出国热。

“上海真正起飞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,黄河路、乍浦路一下子全部起来了。”邵元宝说。

瘦身

剧集放送已经接近尾声,《繁花》到底响不响?

最新一期的《在岛屿读书》录了5个小时,《收获》杂志主编程永新全程在讲《繁花》。《繁花》太响,嗓子都说哑了。

2012年,《繁花》将要在《收获》发表的时候,杂志社给邵元宝寄来校样打印稿,约请他写篇评论和小说同步刊发,但他实在没法一口气读完,就以工作繁忙为由推脱了。即使像他这样在上海呆了几十年的人,对《繁花》都有阅读障碍。

电视剧对小说进行“瘦身”,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想象上海、想象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。“没有这个路径,你会掉进小说《繁花》的世界里,出不来。”

金宇澄的写作轻轻落笔,把自己当说书人,没价价值观,没主张,不美化也不补救,不提升意义和内涵,散发力量的只有叙事。

小说人物众多,一个个生猛活泼,市井气世俗气很浓。电视剧则将主要人物传奇化了,世俗气分派给了一些底层角色。宝总风流倜傥,如何处理生意场上的事,如何处理人际关系、男女关系,处处烘托其举手投足的潇洒做派。李李变身搅动上海金融圈的神秘角色,其实小说里就是一个开饭店的小老板,水没那么深,也没那么杀伐决断。

小说里浮世男女尔虞我诈,虽然不乏同情和怜悯,但关系不远不近,可远可近。写男女,往往女性主动,男性处处守势,怕挑破窗户纸,怕承担责任。电视剧则将人际关系升华了,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谊。“夜东京”伙人聚在一起“要长长久久”,像贾宝玉的大观园。爷叔对梅萍的态度,一方面是稳住她,给宝总留条后路,也不时给予善意的点拨和指引。汪小姐离开外滩27号,玲子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但玲子主动祝贺汪小姐公司开张时,后者马上就冰释前嫌。创业者相互理解、相濡以沫是主调,这就跟“金美林”老板等以邻为壑形成鲜明对比。

邵元宝认为,这种处理方式很高明。“把宝总塑造得情义至上,情义超过了生意经,这就跟‘渣男’撇清了。同时,王家卫很擅长营造暧昧文艺的氛围。宝总跟李李在封闭空间独处时,把两个人拍得很近,没事也跟自己去脑补很多事情。”